

收稿日期:2021-01-18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向度、瓶颈与对策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留住乡村文化记忆才能发展乡村文化,物理空间是乡村文化记忆的基本支撑,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能够进一步强化物理空间的张力。公平的对话语境是拓展有效制度空间的基础,这样才能保证制度空间建构过程中村民在场,在乡村场域内实现生活场与文化场套叠,提升文化主体在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内的活跃程度,形成“政府+村民+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构架。但是在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拓展过程中,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多元虚拟空间正在被挤压,在探索乡村文化记忆的多种举措中,需要在保存社会网络、守住空间线索、形成文化意象、实现平等对话和壮大文化主体等方面做文章,才能构建起乡村文化记忆的多向度表达方式,留住乡村文化记忆、系住乡愁和拓展乡村文化记忆空间。

关键词: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2-0071-1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发展对策研究”(HB17YJ091)。

作者简介: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参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公共事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23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得学术界对乡村的关注点发生了从产业视角向空间视角的转向。从产业角度审视乡村问题时,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乡村经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对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关注度。从空间角度探索乡村振兴的发展问题,研究主体会从各要素均衡发展角度探寻乡村经济发展路径,并将乡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变量加入到乡村社会发展的效用函数当中。文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着乡村社会成员的关系状态。乡村场域内基于熟人社会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成员在长期交往中守望相助又相互制约,形成了一致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每个个体都需要在其他个体的预期内从事实践活动,并成为其他个体生存条件变得更好的前提,乡村社会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迅速积累社会资本。乡村场域内的生存个体通过非纸面的制度约束形成强烈的内在约束,将不需要他人提醒的自觉成为行为习惯,作为乡村文化的一部分储存在记忆中并传承下来,现实的文化空间就成为唤醒记忆物质载体并成

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因此,留住文化符号和保持记忆空间才能够在发展中传承文化和生产文化。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和乡村社会空心化过程中,乡村的生活场、文化场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文化得以附着的物理空间的存在样态在变化,乡村文化的记忆空间也在被压缩,乡村居民缺少了文化的体化记忆和惯习记忆^[1]。缺少了记忆空间,文化将无处安放,无法承接过去和生产未来,因此探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存在形式并探索拓展记忆空间的发展对策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文化的空间载体:文化符码存储的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

(一)记忆是乡村文化的发展纽带

乡村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具有熟人关系的社会网络,世代生活在一起的乡里在长期交往中得以价值同化,群体成员具有相似的生活情趣、价值取向,对乡村文化具有相同的体化实践和审美情趣。每个社会成员都在通过相似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重复着过去的风俗、规则等,将文化味道融合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文化符号、文化印痕记忆过去。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认为,现在的举止重演着过去,身体实践能够将认知记忆和惯习记忆结合在一起^[2]。人们在既定场域内形成了一致性的群体性规则,在心中形成不需要他人提醒的自觉,并通过记忆以文化的方式将这种规则持续传承。人们在既定的社会空间内生存,通过记忆储存先祖创造的文化并通过文化符码重构既有文化和进行文化再造。习惯记忆促成记忆习惯并内化为人们的思维^[3],记忆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纽带,通过转录文化信息构建生活和传承未来。乡村社会的文化主体作为文化资源的存贮器,能够系统地梳理文化资源,并使其固化到物理空间中不断传承下去。因此,研究记忆空间的存在方式和生产方式就非常重要。

(二)物理空间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文化记忆就是要将文化内涵存储起来,可以将文化符码存储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也可以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中并通过实践行为表现出来。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容器可以被看作是狭隘的文化记忆图像^[4],记忆实际上就是在物理空间内留下印记。这说明物理空间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人们通过对文化信息进行编码,通过特定的文化符号将其留在物理空间内,后人再通过解码对文化信息进行翻译、解读、学习、改造,从而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记忆与空间并存^[5],乡村文化附着于实体空间并在实体空间内增加乡村的文化记忆,实体空间是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过去中将乡村社会引向未来^[6]。物理空间是居民生活场的实体依托,见证着有形建筑的变迁过程,实体空间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社会空间,物理空间既是人们解决生活问题的物质手段,又是既定场内共同生活着的群体的一致性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表征,实体空间在此过程中自然就具有了记忆的属性。生活场作为居民活动的空间场域,见证着文化活动和民生形态,承载着文化记忆,成为存储文化信息符码的存贮器。

(三)物理空间的文化属性在于扮演文化角色

实体空间不可能与其中发生的事件相剥离,后人需要通过对物理空间进行考察,才能够还原尘封的历史并找到与该物理空间并存的那段历史记忆。从这个层面看,实体空间的记忆属性在于扮演了文化场角色,生活在其间的群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实体空间产生影响。实体空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需要后人通过对相应的生活场还原后走进与其套叠在一起的文化场。记忆有多重存在形式,包括乡愁情感记忆、文化认同记忆和符号象征记忆^[7],古街、祠堂等都是富有

乡愁记忆的真实场景,构成乡村记忆的文化符号。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被发明的传统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通过重复来灌输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8],重复具有仪式性和象征性特征的文化现象。虽然不同区域的乡土教化存在差异,但历史中形成的惯习及其在生活场中留下的印记会通过实体空间留下不同方式的印痕得以传承下来,通过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进行展露。

(四)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依存

记忆空间不仅体现在实体的物理空间内,也体现在活动的虚拟空间内。记忆文化信息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相互穿插并相互依存,共同担负起发展和创造乡村文化的职责。仪式、风俗、庙场、社戏等都是文化记忆的具体表现形式,仪式远远超出了模仿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文化意义的传承。声音也是记忆空间的存在形式,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认为,人们在谈话中构建着过去^[9]。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储存文化信息的空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物理空间的范畴,以风俗教化为核心形成的惯习空间,以言谈举止为核心形成的体化空间,以碑刻册本为核心形成的刻写空间等,都是承载文化信息的虚拟空间的表达方式,成为多样化的具有更大空间范围的文化信息存贮器。虚拟空间总是与物理空间紧密地粘合在一起,物理空间为文化记忆主体提供了坚实的生存空间,从而能够使文化记忆主体在承继文化信息和接受文化符码过程中,不断创新文化形式和创造文化产品,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

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多向度表达与多样态空间间的联系

根据前文,存储文化的“容器”存在多样化的表现方式,传统意义上的以实物方式存在的物理空间只是众多表现方式中的基本手段,声音、动作、制度以及习惯等都可以成为记忆文化的存储器,在变化着的历史逻辑中展露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文化创造激发多样态的文化空间表现形式。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就需要对文化记忆的样态进行多向度考察,为发展乡村文化拓展记忆空间。如果记忆空间紧紧限制在实体的物理空间层面,空间范围就会被严重压缩,影响文化在空间上的拓展力和时间上的穿透力。物理空间为承载乡村文化构建起了基底,也是构成乡村文化景观的重要实体元素。居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生命呈现为景观的堆积,直接存在的事物退缩为表象^[10],在单独强调承载文化的实体空间过程中,乡村文化的记忆空间就被压缩为物理空间,文化记忆就成为景观表象。因此在探索文化记忆空间时,需要从物理空间拓展到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思维空间,将与实体空间套叠在一起的虚拟空间整合在一起并且构筑起观念和感情^[11],将关注视角从实体空间移向虚拟空间。物理空间以文化景观方式将文化呈现出来,其目标也是记住文化,只有将有界的物理空间与无界的虚拟空间叠加,才能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展示虚拟空间的优势,将文化场与生活场合二为一,文化发展与村民在场同步。

(一)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多向度表达

1. 物理空间向度:乡村文化的承载实体与记忆唤醒纽带

记忆就是同往昔建立联系,物理空间因与文化之间存在内在逻辑^[12],从而作为容纳文化资源的容器在存储乡村记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在容器中翻找具有文化印痕的物质实体,在现实与历史间进行对话,因此留住储存文化信息的物理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记忆依托物理空间而存在,在历史长河中的意识往往被撕裂成碎片,记忆的化身即记忆场是唤醒这些意识片段的关键,但记忆之场存在的前提是已经不存在了

记忆的环境^[13]。发展乡村文化的物理空间存在多种样态,包括图书馆、文化室、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也包括祠堂、庙场、遗迹、古屋、古树、壁画、廊桥、老街、雕塑等,这些能够承载信息的物质实体构成文化场,与村民的生活场叠加在一起。物理空间在历史过程中形成,通过印痕向现代人诉说历史,在现代与传统间搭建起桥梁^[14],这些印痕就是物理空间的文化记忆。物理空间以独特的景观呈现,通过回归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唤醒现代人的文化情愫。因此物理空间不但承载了文化记忆,也吸附了文化情感。实体空间以浓缩的文化信息成为乡村文化场的核心,强化了文化场的辐射力和凝聚力,也成为乡村社会的标志性景观。物理空间的存在样态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需要通过恰当方式融入乡村社会结构,在乡村社会营造追忆文化、传承文化和发展文化的场景,以物理空间为核心对居民的实践活动进行渲染,将物理空间承载的文化信息转化为村民的文化行为。

2. 体化空间向度:通过身体实践对文化再版和承载文化信息

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在身体上^[15],因此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将身体与文化融合,强化身体对文化的体化实践,以文化为先导指导身体做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像柏拉图(Plato)那样,将身体视为灵魂的对立面^[16]。体化空间是承载乡村文化的虚拟空间,空间范围与居民对文化的体化实践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存在差别,文化记忆依附于客观外化物之上,而交往记忆是在体化实践中形成习惯的过程^[17]。体化实践要求实践主体充分参与到文化场当中去,具有较强的即时性和现场感,高度依赖对话语境对人的身心形成强烈的文化渲染,实践主体在心中播下文化种子,成为文化的承载者,通过消化吸收文化信息并加上亲身感受影响身边的人,提升传承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文化吸收者同时也成为文化传承者。在体化实践中,实践主体的身体和思维成为承载文化的空间,经由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将文化影响力从有限的个体传播到无限的群体,从有限空间辐射到无限空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回忆特质,在年龄变化过程中,记忆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就像一本缺页的再版书,成年人因专注日常事务而使记忆变形,文化场赋予老人保存文化印痕的功能,并激励其不断贡献文化记忆的力量^[18]。虽然乡村文化在不断复制和再版过程中拓展着文化的体化空间,但原味的文化中已经平添了更多褶皱。

3. 惯习空间:在生活场以多维度的文化活动承继文化基因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惯习+场域=实践”,这种惯习既是由存在着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完整结构,也是据此生成实践、信仰以及感知的基础^[19]。场域是相互作用的位置间构建起的网络或者结构,一般不具清晰的外部边界,但其中一定蕴含着力量和生气。乡村文化发展的惯习空间即依托乡村土味形成的渲染氛围,处于其间的要素逐渐被同质化,通过代际传承和个体影响形成乡村文化发展环境。乡村社会是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一致性的价值观,乡村社会空间在这种惯性影响下世代传承,在惯习实践中记忆着乡土文化。因此,乡村文化记忆除了通过装进物理空间得以保存外,还需要通过恢复和强化乡村文化场,通过沿袭惯习和营造文化氛围,仪式、语言、习俗、制度、信仰、宗教等都是乡村居民的沟通方式^[20],成为村民惯习的多维表达向度。文化就是村民的生活方式。在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变迁以及由同质群体向异质群体转化过程中,文化元素和文化主体逐渐从乡村社会的文化场中退出,惯习空间的维持和扩展正在面临挑战。惯习空间是通过村民的行为实践展露出的文化场,与物理空间展示的静态的陈列语言以及书本上呈现的刻写实践不同,需要通过村民的

动作、表情、声音、情感等方式与先祖对话,在生活场中植入乡土文化,只有在惯习与村民生活质量提升之间建立起关联,惯习空间的扩大才能够从行政强制转为村民自愿。

4. 制度空间:克服理性无知和增加群体信任感

文化附着于习得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价值理念,文化是一套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依托各种符号和有形提示得到巩固^[21]。制度执行是制度设计者通过设计行为规范使行为对象在实践中践行的过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会影响实践活动者的合作状态和参与积极性,在制度规范与约束对象的利益相左时,制度执行者在与制度实施者博弈过程中就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从而使制度的实施效果打折扣,制度空间也会被压缩。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制度空间就是文化发展制度对乡村场域内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主体的影响范围,鉴于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公共选择的复杂性,制度空间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压挤。在发展乡村文化的公共选择中会存在“阿罗不可能”问题,即个人偏好的混合不可能靠表决程序加总,个人偏好的选择也不可能被集体决策选中,分散的个人选择间总会存在矛盾,因此集体意志也不能完美地得到实现。在进行公共选择过程中,个体如果要得到全部个体选择的充分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更情愿停留在“理性的无知”中,但这种理性的无知会增加个体选择对群体团结的侵蚀,出现个人理性高于集体理性的问题,从而增加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因而在建构制度空间的过程中,增加信息对称程度、个体参与程度,会增加群体的内聚力,并使得个体增加对群体的信任感从而增加固守集体规则的信念。根据以上分析,只有在乡村场域内实现行政权力与村民、社会组织间的平等对话,乡村文化发展的制度空间才能得以巩固和拓展,也才能为记住乡愁提供制度支撑。

5. 刻写空间:通过碑刻和册本传承文化和唤醒后人

刻写空间是以书契记录和册本流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刻写实践呈现的记忆空间,以文字方式记录文化历史。文字能够使死者的声音产生回响,实现现代人与死者对话的愿望^[22]。文本痕迹能够使先祖储存的文化能量释放出来并形成社会力量,在群体中形成感染力,后代人能够复原先辈的对话语境。文字作为永生的媒介和记忆的支撑,在乡村文化记忆过程中能够将风俗、轶事、名人、典故等文化信息以碑刻或者书册方式记录下来,对文化过程、文化事件、文化景观进行详细描画并以档案材料方式传承下来,供后人学习、回味和复活。前文论及的体化空间将对文化的记忆存储在肢体语言中,刻写空间则通过文字记录文化内涵。前文论及,文化在代际传递中会不断变形,而文字记录则可以从变形的文化中将原味的文化萃取出来,因此刻写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着记忆方向,保证了记忆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纯粹性。乡村社会在物质化变迁过程中,当文化对村民生活创造的红利抵不过商业浪潮冲击时,乡村场域内具有匠人精神的文化耕耘者就会被商业磁场所袭夺,清净的文化创造行为从而被喧闹的商业行为所捕获,文化记忆的刻写空间就会被挤压。因此保持和拓展刻写空间的关键是通过重构文化场,为具有匠人精神的文化耕耘者保持静谧的生存空间,并通过投资商在文化资源中品出商业味道,从而为传统文化资源走上现代化道路搭建平台和拓展路径,强化刻写精神、营造刻写氛围和产出刻写成果。刻写空间是文化记忆的前提,也是进一步拓展文化刻写空间的基础。刻写空间收纳和存贮着乡村文化,将风景和记忆封存在碑刻或册本中,等待着传承者将其唤醒。

(二)乡村文化记忆多样态空间的分类依据与相互联系

1. 乡村文化记忆多样态空间的分类依据

随着乡村变迁,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后,乡村社会面临“空心化”的严峻形势,具有较高综

合素养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产业中析出并通过离土离乡寻求更优的择业机会,乡村文化式微使文化传承面临挑战。在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化记忆的样态也正在变迁。物理空间、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挤压,认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各种样态间的联系并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成为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古街、古宅、古桥、古巷等物理空间将文化固化在物质实体中传承下来,后人通过触摸、观赏等方式感受文化的魅力;舞狮、龙灯、舞蹈、节庆等通过声音以及肢体语言将活灵活现的文化呈现出来,肢体动作成为存储文化的体化空间;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融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行为习惯表现出来,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惯习空间成为存储文化的载体;村规民约、法律制度、生活准则、道德标准等纸面的或者非纸面的规则约束规范着村民的行为方式,融入乡村文化家族中,成为承载乡村文化的制度空间。多样态的记忆空间间相互穿插和互相促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记忆的呈现形式,让作为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的乡村居民能够记忆、便于记忆、充分汲取和积极创造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的物理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存在方式受到冲击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强调传承文化的物理空间的同时,进一步重视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的重塑,在乡村场域中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存储方式,对文化空间的呈现方式进行分类,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构措施。物理空间、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按照文化载体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别从物质实体载体、肢体动作载体、风俗习惯载体、规则制度载体以及语言文字载体等方面对记忆空间进行刻画,才能为更好地探索文化的不同存储方式间的联系通道奠定基础。

2. 乡村文化记忆多样态空间间的相互联系

多样态的乡村文化记忆空间之间相互联系,各种样态都有其存在的区域环境,彼此之间通过相互支撑,可以在一种样态的充分发展中形成溢出效应,为其他样态的发展创造条件。物理空间扮演着文化信息存储器的角色,通过建筑、佛塔、祠堂、古街、庙宇或者博物馆、文化室等方式将文化存储起来,后人可以在物理空间内读取文化信息,通过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承袭惯习,体化空间、刻写空间和惯习空间也会相应地得到拓展,乡村社会的生活场、文化场叠加,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也会得到提升,行政意志与村民意志均得到充分表达。文化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基于对称信息构建起平等对话机制,保证了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村民在场和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场,逐渐形成“政府+村民+社会”的文化多元建设主体,文化发展的制度空间经过重构能更多地体现村民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愿望,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系统进一步拓展制度空间。文化发展实现了从行政命令下的植入式供给到市场主导下文化种子的培育式供给的转向,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乡村文化记忆在行政意志、村民愿望和社会力量间得以协同。制度是调节村民行为关系的基本依据,在物质化的乡村场域内,既定时间和既定空间内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在生活场与文化场叠加过程中,会出现村民基于利益博弈的冲突。因此,乡村文化记忆的制度空间拓展与对文化场内村民实践活动的适当限制并不矛盾,前瞻性地处理好个体行为的有限性与制度空间拓展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拓展制度空间就能够在避免因制度供给缺口而造成的物理空间发展滞后问题。因此,在乡村记忆空间的多种存在样态中,制度空间是将其他样态的记忆空间捆绑在一起的依据,物理空间是基本依托,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是彰显制度空间和物理空间文化张力的衍生品。多样态的记忆空间在时间、情感等维度上满足了文化主体唤醒文化经历、感受文化体验的诉求^[23]。

三、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拓展瓶颈

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包括了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行为知识和经验知识,在反复的社会实

践中获得^[24]。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都需要依托生活场建构文化场,将文化体验、文化传承和文化记录转化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文化场与生活场才能够完美套叠。但是由于文化供给模式的路径依赖,文化供给制度场缺乏空间延展力和空间穿透力,物理空间的建构与惯习空间、体化空间和刻写空间之间的衍生链条有待进一步加固,乡村文化拓展记忆空间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和拓展发展空间。

(一)物理空间部分地流变和重构撕碎了乡村文化记忆

物理空间见证着有形建筑的变迁,作为居民活动的物质载体,在场景的人化过程中附着了丰富的文化信息^[25]。物理空间作为村民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域,反映着村民的生活形态,通过文化承载和文化传播承载着文化记忆,文化形态的演变、中断等历史过程都能通过物理空间得到展露。但伴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的物理空间格局在发生变化,继而文化景观也在发生变化,街道、建筑等反映淳朴乡村土味的物理空间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化发展样态,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被压缩,从而弱化了物理空间的历史感和文化感。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诉求在一些地区会排斥传统土味的物理空间。物理空间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流变和重构的问题,导致乡村文化记忆停留在口口相传,声音承载的文化记忆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内的文化记忆时,物理空间附着的文化场就会从生活场中淡出,乡土文化就会在物理空间被压缩而日渐式微。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物理空间记录着生活场内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一致性的象征符号^[26]。这种象征性的符号会伴随物理空间淡出而消退或消失,物理空间的凝聚力也就不复存在,依托物理空间的记忆场也会被撕碎。不能破除物理空间的发展瓶颈,实体空间向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的转化通道也会被堵塞,文化因缺乏得以附着的实体化载体而最终在记忆的内存中消逝。

(二)文化主体不同程度地被抽空导致体化空间收缩

搜寻文化记忆,需要到相应的文化场中进行体验,只有动感的体化空间才能留存这种文化记忆。体化空间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制度作支撑,并将文字表达转录为肢体表达。社戏、仪式、民俗、舞狮等文化形式都是承载文化信息的体化空间^[27],村民通过行为语言将世代相传的文化进行行为表达。村民传承乡土文化的体化实践在生活场与文化场中游走,生活场和文化场进而成为乡村社会空间的两个重要属性。从这个逻辑上看,体化空间将文化场完美地嫁接于生活场,体化空间的建构需要村民在场、制度在场,并通过生活场中的情味表现出来。只有在村民心中植入文化种子,文化元素才能通过体化实践得到话语表达。但是文化产业是长线产业,不但需要厚实的历史作依托,在前期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在财政支撑下构建输血管机制进而形成造血机制,体化空间的建构需要依托乡村文化场内生活主体的集体记忆,体化实践也需要成为大众化实践。随着乡村社会生活场景的变化,乡村社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原子化”问题、乡村文化碎片化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发展空间逐渐变窄等问题,使部分地区的乡村文化人才逐渐被抽空。生活的关注点在更多地移向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部分文化的失忆问题,使乡村文化空间的主体要素严重匮乏,大众化的发展预期与趋于小众化的发展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反差,体化实践的氛围变淡、人群缩小,乡村文化产业的实体化动因被削弱,体化空间趋向干瘪。

(三)文化主体生活性向的转向部分地打碎了惯习空间

在皮埃尔·布迪厄看来,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独立性表现为每个场域都有不同的发展逻辑。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系统而非实体关系系统,场域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空间,其

中存在着各种积极活动着的力量,场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场域之间存在着模糊边界^[28]。每个场域都有独特的性向系统即惯习,惯习是与客观结构存在紧密联系的主观性实践,在集体行为中体现出个性特点,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29]。在发展乡村文化过程中,村民作为乡村场域内的文化主体,需要通过沿袭主观性向并通过张扬集体行为表现出来,前文论及的体化实践在其间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体化空间和物理空间不同程度地被压缩以及乡村文化主体不同程度地被弱化,使承载文化记忆的惯习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承载主体。村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乡村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惯习可能会成为无处安家的幽灵,村民在历史逻辑中形成的饱含文化味的生活方式存在复归的阻力,幽灵会随着时间延续而被冲散。惯习通过历史经验的积累对后代产生影响,乡村居民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的转向挤压着惯习的存在空间,乡村居民受生活方式的冲击,在文化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失去与文化供给主体对话的积极性,文化场域内的次级场域的村民小众生活性向出现各向异性,惯习空间不但被挤压也被打碎,次级场域间的联系也被阻隔。

(四)行政主导下的文化植入忽略了村民意愿表达进而压挤制度空间

前文论及,制度空间即制度的影响范围,当制度空间与乡村社会空间重叠并且能够辐射居民生活场时,生活场才能够成为文化场,制度对场域内的居民实践活动形成的外在他律才能够转变为内在自律,文化场域内的每个个体都能够因文化氛围的熏陶而被渲染成为具有共同生活性向和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传承者和创造者,个体行为自觉通过帕累托改进形成有利于他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每个个体都能在其他个体的预期范围内从事实践活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达成一致,社会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制度空间内的正式制度以及非纸面的行为规范对群体活动实现全覆盖,行政意义上的制度影响范围与现实中的制度覆盖面得以完美叠加。但是在某些时期,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话语权被弱化,部分文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化倾向,这种样式的文化植入不能真正地切入乡村生活场,村民的生活空间内仍然存在文化缺位问题。文化供给制度发挥作用的有效范围被压缩。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层面的话语表达权不能完全得到彰显,能够支撑文化发展的乡村底层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从乡村场域中被挤出。在村民的文化消费意愿表达通道不通畅以及表达不充分情况下,文化供给制度的影响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制度空间在转化为行政力量与村民活动的合作空间过程中仍然缺乏高效的诱导机制,私人选择与公共选择间的不一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制度内卷化问题与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问题同时存在^[30],激励乡村文化发展的有效制度空间变得狭小。“雷声大”的即时性的文化发展样态不能转化为续时性的文化发展张力。

(五)刻写空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能力在不同程度地降低

刻写空间以文字方式留住文化记忆,不但需要村民主体在惯习空间与体化空间内通过实践活动进行话语表达,还需要财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支撑。刻写空间与物理空间、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以大众参与为前提不同,需要具有专业水准的文化人将乡村文化进行文字表达,这需要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主体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充满热情并且具有留住文化记忆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语言与其富含的主导价值并存^[31],刻写空间以更加有保障的方式存储文化的主导价值,村民都是文化主导价值的受益者。乡村社会结构在变迁过程中,刻写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物化价值观冲淡,文化场可能带来的长线收益与实体经济投资带来的确定性的短线收益之间,后者或许更加具有优先选择权,被挤压的刻写空间短时间内不具有再次膨胀的弹性,刻写空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能力在不同程度地降低。在刻写空间的制度支撑不充分时,

具有文化坚守精神的乡村文化主体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问题。刻写空间需要物理空间、制度空间、体化空间和惯习空间做支撑,繁荣活跃的乡村文化场据此才能够为刻写实践平添素材和激发匠人的创作情感,使乡村文化从“小众记忆”转向“大众记忆”。制度缺位导致物理空间、体化空间、刻写空间和惯习空间发展不足,刻写空间从而会缺失物质保障和实践经验,刻写空间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间的穿插能力、历时能力和共时能力降低。

四、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发展对策

留住乡村文化记忆才能够储存情感和系住乡愁,为此,需要以物理空间为依托,前瞻性地思考制度空间、惯习空间、体化空间和刻写空间,从保护自然环境、社会网络、空间线索和壮大文化主体队伍等多层面入手,为留住乡村文化记忆创造条件和拓展空间,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形成高效互动的发展格局,依托乡村生活场发展文化场,处理好空间的存在形式与文化发展形式间的关系,构建起乡村文化记忆的多维表达方式。

(一)保存社会网络和营造基于物理空间的多元虚拟空间

根据前文,物理空间看得见、摸得着,在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较其他空间的存在形式容易受到重视,但是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物理空间也不断因扭曲和变形而被挤压,在乡村场域内需要创建多元投资主体融入文化发展的社会网络,复原、加固和唤醒文化得以传承的物理空间的激励制度,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在重视物理空间发展样态的同时,也需要充分重视制度空间、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刻写空间等乡村文化记忆的虚拟空间,多元化的文化空间穿插和共存更有利于保存乡村文化记忆,形成虚拟空间对物理空间的现实关照。社会网络是支撑虚拟空间的基础,保存社会网络能为发展虚拟空间创造条件。乡村社会群体基于血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建立起来,据此形成的乡村社会网络成为了乡村文化记忆的基础,进而形成多种样态的正式或者非正式联系。乡村场域的物理空间发生变化会影响村民在地理空间上的存在方式进而改变群体内的交往方式,乡村文化记忆的力量也会发生变化。相对不变的社会网络能够使群体内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循环累进中激励增强,社会群体内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在合作式交往中彼此都会成为心理寄托,从而更有利于形成一致性的非制度性的生活准则,并内化为个人素养和养成不需要他人提醒的自觉。在这种氛围中,乡村文化记忆由个体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文化信息传承的安全性。稳定的社会网络不仅是乡村文化的记忆承载,也是创造乡村文化的平台,成为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名片,在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平等对话氛围中,乡村文化主体的文化诉求能够通过话语表达共同拓展制度空间,并激励村民的体化实践、刻写实践,传统的乡土味得以传承,惯习空间得到拓展。

(二)守住和复原储存乡村文化记忆的体化空间线索

乡村场域内的祠堂、寺庙、廊桥、碑刻、雕塑、老街、古树等都是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线索,留住文化印痕才能够长期保持记忆,沿着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文化线索实现当代人与先祖穿过时空的对话,用时间将碎片化的记忆条理化和逻辑化,在回顾既往岁月过程中体味文化精神,感受空间线索的历史感、文化感,与历史文脉和风土人情联系在一起,历史以其特有的形体为人类留下文化记忆。土味文化平添乡村社会对村治规约的敬畏感,强化乡村文化主体对文化场的融入感和获得感。物理空间只是储存了静态的文化符号,只有通过生存在期间的文化主体将静态的文化符号转化为体化空间内的肢体语言和声音信息,才能强化文化的时间穿透力和空间上的拓展力,更好地守住和复原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线索,并将守住和传承文化的行政意愿转化为乡村

社会的集体意识。空间线索在从静态线索向动态线索转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土味和原味,破坏后就很难修复,后人也很难从复原的空间线索中体味历史感。守住空间线索就是守住思维方式以及乡村社会的交往方式。空间显示是乡村历史记忆的物质表达,在人化自然中表达生活向往,先辈精神成为后人的奋斗动力。守住空间线索并不排斥复原土味的文化表达,遗迹、故居、庙场等容易被破坏的空间线索,需要依托刻写空间内文字记录复原,为打造原味的乡村文化空间营造氛围。空间线索作为承载记忆的文化符号,只有制度在场并通过拓展体化空间才能得到保障。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历史化本身也是一种现象,受制于意识与价值变迁,包含着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即对拆毁的欲望与对保留的追求^[32],后者超过前者,才能够不断拓展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完善体化空间成为对后者进一步加固的有效路径。

(三) 瞄准惯习空间促使文化意象从生活场转向文化场

乡村文化记忆需要从整体意象中感知文化的存在,这种整体意象是乡村群体通过感知环境意义构建起的心理图式,将乡村文化场的发展预期与文化记忆进行对比和叠加,形成现实生活中的体化实践、刻写实践并成为惯习空间内的文化内涵。乡村居民的生活惯习融合了从先祖承继下来的文化信息,在发展乡村文化过程中,需要从“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惯习中分解文化信息和挖掘文化元素,从乡村居民的生活场中萃取出文化场,进而强化生活场中的文化元素,让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升级为村民生活场中的文化名片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动力,文化意象转录为文化符号并成为文化记忆的抓手,生活场向文化场的转化才能具备持续发展的诱导机制。实践表明,整体意象并非个别印象的简单相加,需要依托物理空间整合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历经感觉、知觉达到表象的过程,通过集体性向的生活习惯得到现实表达。乡村文化整体意象是在环境线索和空间线索复合基础上形成,整体意象中的标志性文化要素成为抽取文化记忆的钥匙,进而成为联系记忆碎片并成为拓展文化空间的纽带,集体性向的惯习成为承载文化信息的活化石。记忆就是保留时间维度内承载的信息,时间因为记忆而具备可逆性^[33],保存文化意象,就是对文化进行时间管理,现代人在惯习中繁衍历史并还原历史中的文化场景。山川、河渠等自然景观,民俗、节庆等人文活动以及各种文化实体要素构成的空间形态等都是形成文化意象的构成要素,需要在保存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存,在惯习空间中实现完美整合,挖掘生活中的文化资源、保存和拓展惯习空间就能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之间构建起文化线索。静态的文化积淀和动态的人文活动促成承载文化信息的景观,进而形成乡村文化主体的思维形态。整体意象是一种群体惯习行为,是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实践活动^[34],留存整体意象就要保留住群体实践活动即集体记忆的惯习,在乡村社会生活场的基础上套叠文化场,从而实现生活场向文化场的转向。

(四) 基于平等对话语境拓宽乡村文化发展的制度空间

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将行政意志转化为村民行动,从而在政府意愿与村民行动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将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因此,政府作为文化供给主体需要转变工作方式,将村民意愿纳入文化生产函数中,扩大村民的文化诉求意愿表达权,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间寻找边界,在两种力量间构建起高效互动的过渡机制,才能够将行政控制力在乡村文化场全覆盖,形成发展乡村文化的有效制度空间,将发展乡村文化的行政意愿转化为乡村居民的生动实践,将发展乡村文化的思想力转化为实践力和执行力,乡村居民从发展文化的“看客”转化为“演员”甚或“主演”。从乡村文化发展的制度空间形成的实践逻辑看,制度空间并非基于行政力量进行单向度供给而形成,而是在行政力量与乡村居民平等对话基础上通过充分吸纳乡村社会的文化消费意愿后,经由平等对话语境形成,村民不仅是制度空间的接受者也是制度空间的创造者。

制度空间内存在制度实施和制度执行两个维度,当后者的力量弱于前者时,制度空间就会被压缩,在乡村文化服务建设层面,政府只有不断强化责任和提升能力,才能实现从制度实施空间向制度执行空间的转化,制度才会展示魅力。政府拓展乡村文化的记忆空间,关键是将符合文化发展的制度转化为村民行动。村民不仅是制度的执行者,也是文化发展的寻租人,从经济人角度出发,只有当个人理性与制度理性方向一致并且文化发展的利得超出村民的机会收益时,从事文化发展才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政府主导拓展乡村文化的记忆空间,还要拓展处理好即期收益与远期收益的关系,依托文化软实力拉动文化实体经济发展。制度空间需要保证村民在场,并且留出发展余地,村民能够自愿参与其中并能得到持续发展,这样的制度空间涵盖了行政意志、村民意愿,也为社会力量介入留有出入口,将发展文化的政府行为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为,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因制度空间的有效拓展而得以融合。

(五)壮大文化主体拓展乡村文化记忆的刻写空间

刻写空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能力降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主体萎缩,只有扩大支撑刻写空间得以维系的文化主体规模,才能让刻写空间具有持续的未来,这需要基于刻写空间拓展文化主体的生存空间,并对刻写空间进行前瞻性思考。刻写空间通过小众化的文化群体将文化信息以碑刻和册本方式实现大众化的文化享受的发展目标,“小众化”与“大众化”的群体规模的不对称,要求担负文化传承责任的“小众”群体接受更加严格的长期的技能训练,让刻写空间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表现形式更加完美。既然“小众”群体是刻写空间的“主人”,就要将其支撑的文化空间与存在的生活空间实现完美融合,这不但需要以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为依托,也需要国家政策为其保驾护航,为刻写空间拓展发展空间。相对于物理空间、体化空间、制度空间和惯习空间之间具有较宽的穿插通道不同,刻写空间因与其他形式的空间融入方式单一而变得“孤独”。前文论及,刻写空间是保存文化记忆的更加有保障的方式,以文字方式铭记历史,以叙事的方式凝固历史信息和还原历史事件,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被忽视。拓展刻写空间的发展空间,除了需要政策支撑,还需要主动营造市场环境,通过发展多样化的文化实体经济为文化形式与文化创造牵线搭桥,激发乡村社会的文化消费愿望。刻写空间需要从宏大的碑刻和方志的撰写的传统思维定势中走出来,让刻写产品实现艺术化转向,将小众化的需求转变为大众化的需求,变“小众化”生活空间为“大众化”生活空间。刻写空间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展示“刻写产品+刻写过程+刻写工艺”营造刻写文化,全方位地为刻写空间打造卖点,让曾经只为传承文化而存在的“寂寞”文化形式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热点。

五、研究结论

乡村文化记忆是基于物理空间、惯习空间、体化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的有效套叠的集体行为。乡村社会群体通过集体记忆传承文化,守望相助又相互制约,每个人的存在都成为其他个体更好地存在的前提条件。乡村文化记忆通过非纸面的制度约束在其他个体的预期范围内从事实践活动,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在乡村场域内形成生活共同体和价值理念共同体,通过承载文化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展露文化张力。街道、建筑、寺庙、祠堂等承载时间记忆的空间线索是乡村记忆的物理空间,社戏、民俗、册本、传说、典故、节庆等以文字、体态等话语表达方式呈现的记忆空间是乡村记忆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依托实体空间衍生出来,并在承载文化记忆中表现出更大的张力。物理空间是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容器,也是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得以存在的支撑。制度空间在拓展虚拟空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制度制定与制度执行高效对接,才能实现个人理性与制度理性相统一,在发展乡村文化过程中保证村民在场。乡

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多样态的记忆空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瓶颈:物理空间部分地流变和重构撕碎乡村文化记忆;文化主体抽空与体化空间收缩;文化主体生活性向转向打碎惯习空间;行政主导下的文化植入忽略村民意愿表达挤压制度空间;刻写空间历时性和共时性能力降低。只有打破这些发展瓶颈,才能持续推进乡村文化的记忆空间,需要采取的发展对策包括:保存社会网络和营造基于物理空间的多元虚拟空间;守住和复原储存乡村文化记忆的体化空间线索;瞄准惯习空间促使文化意象从生活场转向文化场;基于平等对话语境拓宽乡村文化发展的制度空间;壮大文化主体拓展乡村文化记忆的刻写空间。

参考文献

- [1] 秦炜棋. 历史记忆与空间生产:湖南江永勾蓝瑶传统武术文化演化研究[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85-93.
- [2]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0-108.
- [3] 周尚意,成志芬,夏侯明健. 记忆空间表达及其传承研究: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2016(8):11-17.
- [4]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1-122.
- [5]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33.
- [6] 刘东峰.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传统村落内生动力的激活:基于记忆空间设计的视角[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27-134.
- [7] 袁同凯,房静静. 空间文化与博物馆:古村落历史记忆建构逻辑:以山东雄崖所村为例[J]. 河北学刊,2018(9):169-174.
- [8] 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传统的发明[M]. 顾杭,庞冠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
- [9]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 季斌,王立军,白锡堃,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5.
- [1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
- [11]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8.
- [12] 郑艳姬. 环境、空间与历史记忆:云南“一颗印”民居建筑类型的文化意涵探究[J]. 昆明学院学报,2015(2):139-146.
- [13]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4.
- [14] 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 徐大建,张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
- [15] 王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
- [16] 柏拉图. 斐多[M]. 杨绛,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3.
- [17]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12.
- [18]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2-85.
- [19] 迈克尔·格伦菲尔. 布迪厄:关键概念[M]. 林云柯,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64.
- [20] 杨丽嘉. 文化记忆的体化实践:传统节日儿童传承的人类学基础与路径[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7-13.
- [21]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韩朝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6.
- [22]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1.
- [23] 吕龙,吴悠,黄睿,等. “主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维度及影响效应:以苏州金庭镇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5):69-78.
- [24] 陶东风. 文化研究(第11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

- [25] 鲁西奇.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74.
- [26]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6.
- [27] 张定贵. 地戏仪式与定向记忆: 屯堡人的文化空间建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22 - 30.
- [28]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40 - 145.
- [29] 毕天云.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 学术探索, 2004(1): 32 - 35.
- [30] 孟祥林.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40 - 47.
- [31]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46 - 49.
- [32] 阿莱德·阿斯曼.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 袁斯乔,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12.
- [33] 雅克·勒高夫. 历史与记忆[M].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 3.
- [34] 林琳, 曾永辉. 城市化背景下乡村集体记忆空间的演变: 以番禺旧水坑村为例[J]. 城市问题, 2017(7): 95 - 103.

Direction, Bottleneck and Measure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Construction

MENG Xiang-l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he basic support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is physical space. The incorporating space, habitus space, system space and inscribing space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esence of physical space. The equitable environment for dialogue is the basis of expanding the effective system space, so that the villagers are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space construction. The overlapping of living field and cultural field can be realized in the rural field, which will stimulate the activity of cultural entities in the incorporating space, habitus space and inscribing space, and form a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 villagers + society”. But 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the multi-dimensional virtual space based on the physical space is being squeezed. In exploring various measures to retain rural cultural memory, we need to work on the aspects of preserving social network, keeping space clues, forming cultural imageries, realizing equal dialogue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ubjects. Only by construc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ress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can we keep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especially the nostalgia, and expand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memory space; physical space; virtual space

〔责任编辑:陈济平〕